

◆ 儿女情长

下一个十年

程向军

父亲离开我们十年了。我已经习惯了没有父亲的日子。但我始终能感受到一股目光的凝视或者是一个声音的叮嘱,那就是照顾好母亲。

母亲的身体一直还不错,能吃能睡,能说说笑笑,根本不像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父亲离去后,母亲再也没有回到以前的老宅,而是住到了大姐单位的一套老房里。房子旧旧的,家具也褪去了原有的光泽,但母亲很满意。旧的事物,在她看来顺眼顺手,用起来不心疼,没有压力。这一套“理论”让我对旧物旧人旧事有了不一样的情感。

大姐原本五十五岁退休,但是她凭借过硬的业务能力,神奇地获得高工职称,退休年龄延迟到六十岁。这让母亲骄傲、高兴,她可以安心地在单位大院多住些年了。母亲总是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她只想轻松自在地活着。眼见母亲越来越坐卧不安,我知道该给她换地方了。

母亲不愿意跟我住在一起,按照她的话说,生活习惯不同,大家都不自在。有天,我在网上觅得一套二手房,市中心位置,离我的工作单位非常近,而且是带院子的一楼,周边配套很完善,价格也能接受,我不假思索联络上中介,以最快的速度办好了过户手续,拿到了钥匙。我要给母亲一个惊喜。

没有意外,母亲稀里糊涂住进这个新的小窝后,她逐渐喜欢上这里的一切。每天上班的间隙,我都会过去看她,大喊一声“妈”,她总是以极快的反应速度回应:“哎!”有一天,我跟母亲谈起父亲离世已有十年,心头莫名现出一丝隐忧,说不清担忧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会有这个感觉。

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今年清明节刚过,母亲在我的眼皮底下发病——脑梗!她一边刚放下碗筷,一边说话变得含糊不清,神态异常,我惊觉一定是脑梗来袭!没有丝毫耽搁,我马上联系上大姐,并拨通了医院心内科杨主任电话,驾车把老娘送到了十公里之外的桐城市人民医院急诊通道,我不想浪费一秒!我和大姐推着躺在移动医疗床上的母亲奔波在CT室、心电图室、胃镜中心和病房之间,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在父亲离开十年后又失去母亲!

医生开出的每一个治疗方案我都接受,只要能保住老娘的命,我愿意承担任何风险。许是我们的勇气感动了上天,也许是老娘顽强的求生欲,当然还有医生们的合理救治,经过十多天的治疗,她挺过来了!身体的各项指标渐渐平稳,度过了危险期,但是,脑梗却造成了失语后遗症,母亲不会说话了,一向喜欢聊天谈笑的老娘只能嘟嘟囔囔,像是刚刚咿呀学语的婴儿。然而我们还是喜极而泣,老娘还在我们身边,没有比这更重要了。

母亲八十岁时,亲戚们打来电话,我知道这是提醒我们做儿女的要为老娘做大寿。母亲还是一贯的态度:不做!当初你爸过七岁生日,我是反对的,结果你看,第二年就生病了!母亲理直气壮地说,我悄悄地活在世上多好……我们哭笑不得,只得随她。

现在,母亲已经住进康复科,每天要完成医生制订的各项康复锻炼计划。看着老娘一边嘟嘟囔囔,一边不得不去踩踏着康复机,我感动不已,我已经下定决心,和母亲一起向着下一个十年进发!



和鸣 李海波 摄

◆ 江湖脸谱

英模殷五一

蔡红雄

每年五一节,我和安庆市公安局迎江分局昔日的战友一样,总是想起和殷五一在一起工作的点点滴滴。

26年前的一天上午,老科长张清河对前来送材料的一位派出所所长说:“殷副所长到上海住院了,你还不知道?”老科长一改平时宏亮的声调,语气压抑沉重。天天和老科长在一起工作,只有我能体会到这声调里的含义:他挂念老殷在沪的复诊情况,希望他的病情能够好转,希望他安心在沪治疗,希望他不要担心所里工作,希望家属不要过于焦虑、担忧。

我的心里更是五味杂陈。入警以后,我在分局机关的五楼办公。人民路派出所所在分局大楼的入口处,我进进出出都要和殷五一碰面,几乎每次见到,他都是风风火火开着带斗的三轮外出办案。一个三伏热天,下午快下班时,他见我急着头冒汗,主动开车,送我到市局拿当夜开展反盗窃自行车专项斗争统一行动的明传电报,我拿到电报后,他又风驰电掣送我到迎江区委,给时任区委领导批阅。回到分局,我们吃了一份盒饭,在参加当晚的会议后,殷五一带队的一组连夜出发,披星戴月赶赴江南追缴赃车。

1989年8月3日,迎江区委区政府慰问公安民警,活动安排在人民路派出所会议室。分局副政委、全国公安战线二级英雄模范张新国和我代表分局机关参加活动,当少先队员上台给我们佩戴红领巾,本是活动主角的殷五一把我推向前,自己却在一旁站立,记者所拍的照片刊登在次日的《安庆日报》上。那张照片,让我定格在安庆公安两位英雄模范中间,这是我从警生涯的荣誉与荣耀,鞭策着我,感动着我,永远跟随着英模的足迹,不忘初心、矢志前行。自那以后,不论在什么场合,只要是合影,我都会像殷五一一样站立在旁边。

我入党转正的那天晚上,殷五一和我都在值班。在分局院子里,他如师如兄如前辈,谆谆告诫我严于律己,并举了身边违规违纪的例子,告诉我“100减1等于零”的道理,让我始终心存敬畏、心植戒尺。二十年后,我在警校每期新警纪律动员会或在其他场合讲话时,总会结合他的告诫,告诉年轻民警要牢记慎独、自律从“一”开始,并作现身说法:我自己从警38年,做到了“五个一”,即“不抽一支违纪烟、不喝一杯禁令酒、不碰一次游戏机、不涉足一步灯红酒绿娱乐场所、不交往一个涉黄赌毒黑贪腐枉法的人”,像殷五一那样,三十多年来坚持家与单位“两点一线”,心无旁骛,一门心思投入工作。

安庆公安事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创新与奋力前行。张新国、殷五一、毕伟、苏方宏、熊裕进、周磊、殷友、桂绍军、高青等人就是公安群体的杰出代表。

当年,殷五一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我把撰写的人物通讯《生命在奋斗中延续——记人民路派出所副所长殷五一》呈送时任局领导审阅,后被省、市媒体刊载,并经省公安厅宣传处推荐刊登在省公安厅《公安理论与实践》杂志“警界风采”的专栏上。

今年春节前,我接到殷五一的电话,他依旧如二十年前一样关心、鞭策我。放下电话,我的心里如大海翻腾,那是一位兄长的祝福和鞭策,是战友深深的情谊,身边有这样一位英雄式的人物,我何其有幸。

◆ 流年碎影

母亲在黄泥镇的日子

潘勇志

1930年4月3日,农历三月初五,母亲出生在安庆市的一个以卷烟为生的手工业者家庭。作为家中独女,母亲无娇矜之气,11岁之前一直在家帮着卷烟,12岁开始断断续续读了一年私塾和两年高小,16岁时考上当时的安庆女中,是学校的篮、排球手,曾代表女中参加过省级女子长跑比赛,是许多同学的崇拜者,偶有富家同学还主动送她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

1949年4月安庆解放,19岁的母亲开始在街道工作。她工作突出,多次受到市、区领导的表扬。1954年与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等一起出席了在合肥召开的安徽省首届青年团代表大会。1955年,她随父亲来到潜山,辗转在余井、杜埠、暗冲、五甲、王河等多个乡,从粮站保管员一路干到乡妇联主任。1956年余井大桥竣工时,与严凤英等人有多张劳动时的合影。

1958年,母亲被调到黄泥公社任妇联主任,后被选为黄泥公社副社长,成为当时潜山县唯一的女公社社长,整整十八载,村村户户、河河沟沟都留下了母亲的足迹,她奋战在春种、双抢、抗旱、抗洪前线,每遇田地、水利和邻里纠纷,只要母亲出现,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1970年代初,黄泥公社急需农药、化肥、水泥和抗洪救灾等物资,母亲每年都要在安

庆军人招待所所长住一段时间,联系地区计委和地区粮食局,四处奔走采购物资和调运余粮。母亲早期在黄泥公社以及后来调人民劳局工作期间,为黄泥公社的青年和下放知青的招工、参军、招生,为复员、伤残军人的安置补助,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回乡干部工人的工资恢复,为“五保户”的救济做了大量工作。母亲还是黄泥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之一,会拉二胡、吹口琴、唱革命歌曲,与那些朝气蓬勃的青年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情谊,其中健在的人至今还津津乐道母亲的趣事。

1970年代初,段君毅、李大章等老革命家在黄泥流放期间,住在公社的偏房里,所有公社干部都避而远之。我是唯一常住公社的干部子女,母亲常叫我探视他们,还买了副象棋叫我陪段爹爹下,偶有下放知青探亲回来送给母亲香烟、点心,她又会让我分送一点给他们。

1987年,母亲离世,葬礼很轰动,灵车去往殡仪馆的路上,跪着很多白发人,很多人自发宰鸡、烧纸、燃鞭、跪拜、祭送。母亲这辈子没留下金银钱财,可黄泥的山川、田垄间处处刻下她的痕迹。当年抗洪时她扛过的沙袋早已融作堤岸的泥土,晒谷场的石碾子也有半截沉入地里,调解纠纷矛盾时拍过的木桌已不知去向,但她的身影永远烙在黄泥这片土地的褶皱里。

